



永远的丰碑

——以血肉浇铸的不屈“冰雕”

□ 郑学富

最近在全国上映的电影《长津湖》，以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寒严酷环境下坚守阵地奋勇杀敌的故事。此役中的“冰雕连”成为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从东西两路呈钳型攻势向鸭绿江全线推进，直逼朝鲜政府临时所在地——江界，狂妄地声称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面对战局的突然变化，中央军委急调正在山东泰安、曲阜地区整训的第9兵团入朝作战。1950年11月3日，作为兵团先头部队的第27军刚到沈阳，就改用汽车运至长甸河口渡江入朝。11月5日，第20军首趟军列驶抵沈阳，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贺晋年到站台上看望部队，愕然发现这支来自华东的劲旅，竟然戴着大棉帽，穿着胶鞋，身上的棉衣很单薄。情急之下，贺晋年紧急动员东北军区机关干部和直属队，脱下身上的冬装送给第20军。11月8日，第20军大部队的进抵沈阳地区，东北军区当即决定特事特办，将为第13兵团准备的3.5万件棉大衣转交给第20军。由于半岛北部东线军情似火，第9兵团没等到后方将御寒衣物筹措齐全，就匆匆于11月11日入朝参战。

为达成战役的突然性，10余万志愿军昼伏夜行，翻山越岭，隐蔽接敌。衣着单薄的志愿军官兵忍受着酷寒、饥饿和疲劳，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脉和树林中连续行军，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千难万险，悄无声息地开进长津湖预设战场。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位于赴战岭山脉与狼林山脉之间，由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向北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的湖泊，最后注入鸭绿江。在长津湖以东约30公里，是由长津江最大支流赴战江所形成的赴战湖，两大湖泊及其附近地区就被称为长津湖地区。两湖周围崇山林立，平均海拔约1300米，山上林木繁盛，山间道路狭窄，偶有几处村落也是人烟寥落。长津湖地区一般从10月下旬开始进入冬季，至11月下旬日平均气温可下降到零下27度。1950年11月下旬，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积雪达40厘米厚，气温骤降到零下30度，个别地区降到零下40多度。未来得及装备上寒区作战服装的第9兵团官兵遇到了百年未遇的严寒。多年后，宋时轮将军回忆说：“其艰苦程度超过长征！”

11月27日晚，狂风呼啸，大雪纷飞。志愿军10余万大军已经隐藏在朝鲜北部广袤的山地和丛林当中了。突然，林海雪原中传出惊天动地的军号声和呐喊声，10多万志愿军将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美军。激战一夜，将美军第7师和陆战第1师分割包围于下碣隅里、柳潭里、新兴里和古土里地区。被围美军为打开通路，连续不断地猛攻志愿军阵地。志愿军官兵一面对被围美军展开攻击，一面坚决抗击美军反扑。

第20军第59师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队伍，前身就是著名的“沙家浜部队”。师长戴克

林是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6岁参加红军，参加过长征。近20年的战斗生涯中多次负伤，从头到脚共有七处大的伤痕，是一员能文能武的虎将。59师的任务是：迂回到柳潭里以南，切断柳潭里美军南逃的退路。于是，戴克林命令177团攻占并坚守死鹰岭及其以北、以东地区，这样就切断了敌人南撤的通道。

死鹰岭位于长津湖南端新兴里以东约2公里，是小白山地区群山中海拔1519米的高峰。由于山顶一带的怪石向东延伸，如同尖锐的鹰嘴，一簇参天的杉柏长在鹰颈上，状如中箭而死的苍鹰，故名死鹰岭。沿着山麓有一条长年冰冻的公路蜿蜒贯穿，连接着下碣隅里、柳潭里，死鹰岭矗立在这两地之间。

志愿军177团接连日跋涉冰天雪地，插入敌后，于28日拂晓，拦腰楔入公路，以1个营的兵力攻占死鹰岭，切断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美军的联系，阻止美军南撤北援。美军为保住死鹰岭这一战略要地，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从东西两个方向连续向驻守在高地上志愿军发起疯狂猛攻。坚守在死鹰岭上的志愿军勇士，冒着极端严寒，连续奋战6个昼夜，与敌反复争夺，阵地多次失而复得，紧紧卡住了敌人的退路。12月3日，突围美军在下碣隅里美军的接应下，猛攻死鹰岭阵地。坚守主峰的志愿军战士只剩下60多人，他们以坚强的意志顽强阻击，打退敌人8次冲锋。但是战役预备队没能及时赶到，部队濒临弹尽粮绝，加上天寒地冻，战士脚冻坏了，连路也走不动，最后只好眼睁睁看着残敌从公路上跑掉。

打死鹰岭的美军继续向西兴里一线我军177团2营阵地进攻。西兴里一线是志愿军最后的防御阵地，如果让美军通过，美军就和下碣隅里美军会合，就成功突围了。为了拿下2营阵地，美军采取两路夹击南北对进的战术。

177团2营负责阻击下碣隅里美军派出的救援部队，2营打得英勇顽强，将美军救援部队击退。而在侧翼的6连阵地一直没有开枪阻击。后来，当接防部队上来时发现，全连125名官兵已全部冻死在高地上，他们一个个身着单薄的军装，持枪俯卧在战壕里，保持着战斗姿势，怒目注视前方，随时准备跃然冲杀。他们全都化作一群晶莹的冰雕，冰雪在他们的脸上凝结成了洁白的寒霜，每个人的眉毛胡子上都挂着重密细小而又坚硬的冰凌，微风拂过，铮铮有声。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战况的电报中写道：战斗打响后，该连无人站起，到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干部战士呈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细查尸体无任何伤痕与血迹。

清理战场时，在一名战士的衣兜里发现了写在一张照片背面的绝笔诗：“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的(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这名战士

名字叫宋阿毛，上海人。这首诗写得朴实自然，文字流畅，是宋阿毛生命最后时刻的真情流露，表达了高昂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天地为之动容。

在第9兵团，冰雕连何止一个？据相关战史资料记载：在围攻美31团的战斗中，第27军80师242团5连由于长时间埋伏在雪地里，当冲锋号吹响时，再无人站起来冲击，除一名掉队战士和一名通信员外，全连100余干部战士全都冻死在雪地里，但仍保持着准备战斗的姿势；第20军60师180团2连129名官兵在水门桥南侧设伏，准备迎头痛击过桥美军，可是已经冻僵10余日的战士全都站不起来了，美陆战1师冲过水门桥时看到的是已经冻僵的中国士兵。美军的里兹伯格团长面对这群用血肉之躯浇铸成的巍巍冰雕，肃然起敬，不由地举手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他的内心肯定感到了强烈的震撼，中国军人拥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是任何先进武器都征服不了的。

这些冰雪勇士，为了中国人能挺直腰杆，为了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东方，他们却永远站不起来了。“冰雕连”体现了志愿军战士严守纪律的严谨作风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境界，树立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

长津湖之战，志愿军第9兵团在武器装备严重落后，运输补给严重不足，冻饿交加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灵活顽强作战，给美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共歼敌1.3万余人，并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彻底扭转了东线战场的局面。毛泽东、彭德怀均致电宋时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在12月17日的电报中指出：“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4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

美陆战1师借助绝对的海空优势，最后从海路撤退。美军中校戴维斯形容这场战斗说：“海军陆战队用了70个小时近4天的时间，走完了20公里的路。这绝不是一次漫步，而是从死神的怀抱里逃出来的挣扎。这在海军陆战队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志愿军第9兵团成功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地区，但是也付出沉重代价。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由军史研究专家双石撰著《开国第一战》记载：“第9兵团战斗伤亡19202人，冻伤减员28954人，其中冻亡1000余人，冻伤后救治不及而致亡者3000余人；减员总数48156人。减员数量为全兵团兵员总数的32.1%。”

1952年9月，第9兵团从朝鲜回国，司令员宋时轮在鸭绿江边下车，神情肃穆，迎着萧瑟秋风，面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脱帽深深鞠躬90度，然后戴上军帽再行庄严的军礼，向长眠于长津湖冰天雪地之间的志愿军官兵致敬！此时此刻，身经百战的将军已是泪流满面。



南梁红色故事

在环县山城堡村断马峡岷东山畔有一处红军战壕，长约120米，宽1.2米左右，深0.8到1米不等，猫儿洞、射击口清晰可见。当地老年人说，这里就是著名的山城堡战役遗址。2009年8月，彭德怀元帅侄女彭钢少将慕名来到这里，她穿行于红军战壕间，抚摸着经过战争洗礼的粒粒黄土，激动地说：“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蒋介石极为惊恐，调集5个军10多个师260个团，计20余万人，由南向北分四路追击红军，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

为了击破国民党的进攻，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开辟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宁夏战役。11月初，由于敌情的不断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红军不得不放弃西征以来开辟的部分新解放区东撤。为了有效打击敌人，中革军委接连向红军各部队下达指示，指出：“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统一战线。”中革军委主席团又发电报给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各部队向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地区隐蔽集结。

山城堡海拔1600多米，北起甜水堡，向东南方向蜿蜒穿行，长约90余里。山城堡两边沟沟辐辏，梁梁起伏，北控塞外，南扼关隘，历来为兵家要塞。因其地形复杂，便于大部队设伏。此地人烟稀少，只有数户人家。“此处有一股笔孔大的泉水，胡宗南部当日离开甜水堡(在山城堡以西40余里)后，都找不到饮水，非到山城堡不可。”这孔泉水至今保护完好，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泉”。

11月的山城堡，已降大雪，红军指战员衣衫单薄，粮食供给不足，武器弹药缺乏。按照中央命令和彭德怀的统一指挥，15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经豫旺堡径直向山城堡地区集结；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一军，从同心城分别进至萌城、甜水堡地区，向山城堡靠近。

当时，国民党马炳文部西渡黄河追击西路红军；王均部到达同心城后停止了推进；东北军王以哲部经红军的统战工作，在胡宗南部右翼缓慢推进；只有胡宗南第一军在攻占同心城后，错误地认为红军不堪一击，十分骄横，将所部四个师分成三路，孤军深入追击红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方向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由田家原向山城堡方向突击。

11月18日，三个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联名签发《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指示红一、二、四方面军各兵团军事政治首长：“从明日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必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诚与最吃苦耐劳的意志去执行……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当晚，党中央派周恩来专程从陕北保安赶到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环县洪德河连湾，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等红军将领，共同研究部署作战方案。

(文章选自《南梁红色故事》·连载上)

敦煌党河大桥二百年建桥记

□ 孙宏



党河是敦煌人民的母亲河，发源于祁连山，汇归于北湖。主要依靠冰川雪山融水补给。由于冰川雪山融雪受温度和季节影响大，总是“夏涨大于江，秋涸小于溪”。“夏涉水涨，几至天顶；冬涉水凝，若陷利刃”。而且“河滩沙深，为桥辄圯”。两岸百姓一直苦于往来涉水，只有望洋之叹！

清嘉庆八年(1803年)敦煌人童荣出资在党河上建桥。最终因为工程艰巨，资金物资耗费量大，建桥施工技术要求高，工程被迫停工。

道光十一年(1831年)冬，许乃毅从山丹调任敦煌第38任知县。许乃毅，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人，曾与林则徐唱和赠答，著有《瑞芳轩诗钞》。他上任第二年便开始谋划准备建桥事宜。根据道光十年(1830年)苏履吉知县普查记载的数据：当时敦煌有2448户，20840人，没有多少商贾大户。通过各方努力，共筹到建桥资金1840两。道光十三年(1833)正月，许乃毅下令开工

建桥。首先，选入水耐泡不朽的沙枣木制作成笼子，再用一定比例的砖石草土填实，外面再护上松木、毛柳和白刺，层层堆积垒砌成8个桥墩，分成4洞。然后在桥墩架上木头，木头上再铺上掺合好的粘土。建好的桥高一丈五尺，宽五丈余。在东西两端再立木柱，凸现出桥的美观完整大气。大桥得名“柳桥”。这是清代敦煌移民建县以来修筑的第一座桥。

道光十五年(1835年)，许乃毅升任安西直隶州牧。张锡田接任敦煌第39任知县。道光十九年(1839年)夏，由于“河之岸底尽沙，水注流沙，根基难固”，柳桥被洪水冲垮，两岸百姓再次面临交通阻断之苦。张锡田即刻上手，组织重修。据《代申典典修党河桥碑记》载：及继续修时，土石瓦砾，荆棘错杂其中，基址渐固矣。因分十二有洞，以杀水势，断木为槩，编木为板，角构连，回环系属。即成，榜曰“十二连桥”。基础桥墩和桥面的用料和施工方法都做了较大改进，桥洞由四洞增加为十二洞。名字也由“柳桥”改为“十二连桥”。这是党河上建起的第二座桥。

咸丰四年(1854年)夏，党河洪水暴涨，十二连桥“漂没无存，行者苦之”。当年岁末，申典典(清拔贡举人)任敦煌第44任知县。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初四，申典典和众邑人士选择开工建设新桥。该桥用时36天即告竣工。新的党河大桥最重要的改进是处理桥墩基础。改十二连桥为十洞，计长二十丈，竖柱二十二根，河八尺，外高一丈，宽一丈六尺，以木板围以长栏，大桥两岸用石头和柴刺镶嵌，东西再建埝楔两座，比以前更加坚固壮观。这是党河上建起的第三座桥。

光绪四年(1878年)夏，洪水再次冲毁党河大桥。当时第50任敦煌知县凤庚(字雨村)在敦煌刚刚任知

县半年，对重新修筑党河大桥丝毫没有怠慢。凤庚根据众邑人士建议，重点对处理桥墩基础和用料做了改进。采用以石建基，以木作梁的基本措施。以“木脚入水易朽，改木为石，特当时觅石有限，故周围镶以巨石，中实以碎”的具体施工方法。凤庚在敦煌任县不满两年时间，主持重修党河大桥没有立碑，也没有留下记载，但继任修桥者把这一段事迹记录了下来。

光绪十六年(1890年)夏，“河水盛涨，碎石冲溜，围石倾欹，桥又坏”。第56任知县张祥会(今河南人)主政敦煌。张祥会体恤民情，考虑到重修工程“或费千余缗，或费二千缗，工役仍责之丁户”。又“念民力凋敝，若照前捐摊户实有不逮”“立意不累民间一钱”修建起党河上第五座桥。

光绪廿四年(1898年)，第59任知县张元森(今陕西人)主政敦煌。1898年6月，“木梁坏，桥有圯”。张元森哀民生之多艰，命由时任典史贺德全权负责修桥工程。不但不累民间分文，并且施工期间，监工、工匠全部发给口粮。第六次党河大桥重修工程竣工后，全县绅士农耆百姓推举时任敦煌儒学巡道郭铸嘉先生作《重修党河桥碑记》。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朱恩荣任敦煌县县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7月，山雨暴发，河水猛涨，党河大桥尽被洪水冲毁。朱恩荣决定8月动工建设。施工期间，对桥墩基础做了大的改进，掘河底七八尺，垫漫卵石，然后立柱。柱周围笼罩沙砾石囊，再压上树枝草，防止大水冲刷。若遇洪水冲激，桥墩不摇，桥才能稳固不毁。桥西备退水闸一道，开挖退水沟，以减消水势，减少洪水对桥的冲激。桥东西两端再各建两座牌楼，东西正面题“党桥”，东牌楼内题“鳌背

同登”，西牌楼内题“虹霓乍现”。横桥下居中，木刻水兽一，仰首南望，蜿蜒欲活，是螭腹(《升庵外集》“龙生九子，不成龙其六，曰螭腹”。故立于桥柱是也。)之象。重建工程用水款千余元，用工八千余，历时2个月，当年10月竣工。这是党河上建起的第七座桥，一直使用到上世纪60年代。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在修筑南疆公路时，党河上架起了一座较为正规坚固的木结构公路桥。此桥全长80米，宽4米，40孔，桥面两边有高1.5米天蓝色木栏。从1945年一直用到60年代初。这个时期党河上有两座不同风格的木桥，朱恩荣县长修的桥在南，南疆公路桥在北，基本满足了当时敦煌百姓通行。这是党河上建起的第八座桥。

1960年，红当公路贯通在南疆公路木桥位置上，党河上建起了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桥长51米，宽6米，6孔。结束了党河架木质桥的历史，可满足载重汽车、拖拉机等机械设备通行。这是党河上建起的第九座桥。

1979年7月，祁连山连续降雨，引起山洪暴发，党河大桥第八次被洪水冲毁。1981年，省工路局修建6孔钢筋混凝土大桥，桥墩采用灌注桩基础，桥面采用连续工字梁弯板。桥长100米，宽12.5米，双向两车道两边设有非机动车道，钢筋混凝土材质栏杆，当年10月竣工，极大的改变了交通条件。这是党河上建起的第十座桥。

2005年，西库公路建设项目实施，党河上建起了月牙泉大桥。2007年，党河风情线建设项目实施，又建起了白马塔大桥。景观大道、215连接线、敦格铁路和敦当高速等项目实施，又相继建起了几座大桥，彻底满足了各种交通需求。

从乾隆廿五年(1860年)年敦煌建县，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王朝在敦煌共任命了68任知县，民国时期有30多任县长。其中清代6任知县和民国一任县长践行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党河大桥是一项百年民心工程，从清代的许乃毅到民国的朱恩荣，每一任建桥者都践行了恤民情、惠民生。他们真心为民的炽热情怀，值得后人敬仰。